

A vertical yellow strip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features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in black ink. Below the text, there is a faint illustration of a deer, likely a Qilin, a mythical creatur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light, textured paper with faint, reddish-brown lines.

傅柯的思維取向 —另類的歷史書寫

黃 煜 文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印行

傅柯的思維取向 —另類的歷史書寫

黃 煜 文

黃煜文君，本校八十七學年度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本論文由周樑楷教授指導。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初版

文史叢刊之一一一：

傅柯的思維取向——另類的歷史書寫

出版者：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主編者：高葉 明 士
 ： 國 良

著作者：黃 煜 文

發行者：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印刷者：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18號

電話：(02)2308-7600 (代表號)

ISBN 957-02-6733-4

目次

緒論	1
第一節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界的回應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12
第一章 從心理學看心智疾病	17
第一節 心智醫學與機體醫學	20
第二節 對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批判	22
第三節 存在主義心理學與馬克思主義 心理學的並陳與矛盾	28
第二章 從文化角度看瘋狂	35
第一節 杜梅齊爾與拉康	38
第二節 沉默考古學：隔離手勢的挖掘	46
第三節 隔離手勢的最深層：他者意識	50
第四節 《瘋狂史》的歷史形式	54
一、論述與體制的關係	55
二、體驗史的意義	59
三、斷裂史觀的呈現	62
第三章 醫學與人類科學	69
第一節 《瘋狂史》的遺緒：《死亡的迷宮》與	

《傅柯/布朗蕭》	70
第二節 結構主義與傅柯	74
第三節 醫學知覺考古學：醫學論述的斷裂	87
一、空間	89
二、語言	92
三、死亡	96
第四節 人類科學考古學：知識型的斷裂	99
一、文藝復興時代	101
二、古典時代	102
三、現代	107
第五節 《臨床醫學的誕生》與《事物的秩序》的 歷史形式	115
一、符號系統史	116
二、傅柯符號學取向的弱點	119
第四章 從考古學到系譜學	123
第一節 知識考古學	127
一、論述構成	130
二、考古學的任務與目標	140
三、考古學的弱點	143
第二節 系譜學	146
一、〈論語言〉	148
二、〈尼采、系譜學、歷史〉	150

第五章 監獄與性意識.....	157
第一節 《規訓與懲罰》	162
一、系譜學內容的再商榷.....	165
二、酷刑、監獄與規訓.....	168
第二節 《性意識史》	179
第三節 《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的 歷史形式.....	184
結 論.....	189
參考書目.....	197

緒 論

第一節 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界的回應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興起於一九七〇年代，它象徵一種新的建築風格。一九七五年，反對「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的建築師詹克斯(Charles Jencks)以「後現代主義」一詞掀起新的建築風。詹克斯不滿功能主義只考慮物品的實用性，而不考慮美學的作法；詹克斯認為，物品除了實用之外，還應融入藝術層面的裝飾與美感，才能使人在使用物品之際還能享有樂趣。詹克斯所批評的功能主義，其實屬於現代藝術的一環，是現代建築設計的依歸。我們在大城市所看到的赤裸光禿、毫無捲軸花飾或壁柱的高樓大廈，全出自功能主義派建築師的手筆。¹功能主義是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遺產，在啓蒙的影響下，現代建築朝向理性、秩序與實用前進，採取簡潔有力的形式，明快地表現房屋的線條。所以，一九七〇年代所掀起的反功能主義風，其實也是一種反啓蒙、反現代主義的現象，因此才被稱為「後一現代主義」。

¹ E. H. Gombrich, 《藝術的故事》，雨云譯，(台北：聯經，1997)，頁557-560，621。

一九七〇年代興起的後現代主義並不只局限在建築界與藝術界，由於它象徵社會上所瀰漫的一股對於現代生活的厭倦與不滿，因此很快就擴散到人文思想領域，遂造成對啓蒙傳統的衝擊，並引起思想界的廣泛注意；其討論之盛，很快就超越最早掀起這波反啓蒙浪潮的建築界，使人文思想界反而成爲後現代主義最主要的流行區域，歷史學在此當然也涉入其中。因此，本文所提的後現代主義者，將專指在人文思想領域持後現代主義立場的學者或思想家，而不論及其他領域的工作者。

後現代主義反啓蒙，但卻並不是第一個反啓蒙的思潮。反啓蒙的潮流，自啓蒙運動以來，比較明顯的可分爲三波。第一波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浪漫主義(Romanticism)；第二波是從十九世紀末延續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三〇年代，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海德格(Martine Heidegger, 1889-1976)爲代表；第三波就是一九七〇年代的後現代主義。²這三波反啓蒙的思潮都各有不同的取向，但卻逐步取消人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第一波要求在理性之外仍能重視人意識面上的感覺與非理性要素；第二波則要求返歸人的直覺，掌握人在意識世界之前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第三波則宣佈主體已死(death of the subject)，不管是理性、情感或是直覺，都伴隨著主體消失而消失。後現代主義之所以能宣稱主體消失，其理論基礎得自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語言學。索緒爾認爲，

² 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ng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7), p. 146.

語言並不僅僅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工具，也不僅僅是人類爲了指涉外在世界所設定的符號；語言其實是綜合了個人表達行爲與語言慣習而成的，也就是說，人必須在接受語言慣習下表達，才有可能讓人理解，若是任意運用語言，則一定無法與人溝通。因此，語言自成一個系統，它並不只是人可以任意更動或運用的工具。索緒爾的想法被人推擴的結果，造成語言系統凌駕於人的意識之上。人之所以能創造並運用語言，是因爲人的潛意識中本來就有語言結構，因此人才能設定能指(signifier)來建構語言系統並加以運用。所以，本來看起來是人運用語言，其實是語言藉著人來創造自己。所以人並不是真正的創造者，語言系統才是。後現代主義便是運用這種語言理論，架空了主體，並因此將附隨主體存在的理性也一併取消，這便構成了其作爲第三波反啓蒙的特點。

後現代主義對啓蒙運動的攻擊，主要可分爲三方面：主體性（或稱理性的能動主體（rational human agent））、³ 俗世的救贖觀念（或稱進步觀）以及科學。首先在主體性方面，前面已經提過，後現代主義認爲不是人運用語言，因爲語言早就潛藏在人的潛意識層中，人的所作所爲完全只是語言結構的反映，所以是語言藉著人來展現自己；而既然人只是語言系統藉以吐露自己的工具，那麼強調人有自由意志（free will）與理性來決定與思考也就沒有任何意義，自由意志與理性因此可以取消。其次在進步觀方面，後現代主義既然不認爲人具有能動性來自主地創造事物，因此將以「人爲理性的能動主體」爲前提的歷史哲學予以否定。後

³ 理性的能動主體，指的是人的主體性表現在人能夠主動以理性來施爲或創生事物。

現代主義認為，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與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建立的歷史哲學乃是啓蒙運動的遺產。啓蒙運動在去除神意(Providence)並抬高人的地位的過程中，神意史觀也相應作了調整，因此歷史哲學與神意史觀的差別只在於將歷史主角由神意換成人的自由意志與理性。所以，歷史哲學乃是世俗化的神意史觀，仍然具有濃厚的目的論(teleology)與進步觀。後現代主義既然否定人的主體性，自然也否定歷史哲學及其附隨的進步觀與目的論。後現代主義這種反進步觀的態度，也延伸到歷史學。由於西方歷史學的研究長久以來將西方文明視為世界諸文明中最優越者，這種看法其實也帶有進步觀，後現代主義對此也不予認同。最後在科學方面，後現代主義既然否認主體性的存在，那麼藉由理性所建立的知識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主體性的消失，因此使得與主體性相對的客觀性也失去意義；啓蒙運動求真的基礎，便在於主體以理性來獲取客觀性以建立知識與真理，也就是說，知識與真理的基礎，完全奠定在主體性與客觀性的對立上。人若能夠以理性、邏輯來進行研究，就能順利跳脫主觀而達致客觀，因此能獲得恆久不移的真理與知識；而人類若能不斷用理性來探索世界，必能不斷去除既有知識中的錯誤部分，而越趨完美，越趨進步。然而，在後現代主義取消主體性之後，求真的想法與知識的性質也受到質疑。⁴

後現代主義對啓蒙運動的批判，對歷史學也產生極大的衝擊。後現代主義批判主體性、進步觀與科學，而歷史專業中的大

⁴ Joyce Appleby, et al. eds.,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387.

部份學者至今仍難以接受一部人在其中完全沒有能動性的歷史，因此也很難相信人不具自主意識因而無法改善自己與周遭世界，同時更不可能認同後現代主義對知識的看法，因為它直接取消歷史學作為一門知識而存在的理由。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其實不僅於此，真正的威脅還在於後現代主義以語言學的角度切入，將歷史作品視為文學作品，將歷史家的求真事業變成了創作事業。索緒爾認為，能指是人類為了用來指涉事物所獨斷設定的符號，能指所指涉的事物則叫所指(signified)：所指是自然存在物，而能指則是人工的創造物。後現代主義推衍索緒爾的理論，認為歷史作品是史家所獨斷設定的能指，而存在於過去的歷史事實則是所指；史家以能指(歷史作品)來指涉所指(歷史事實)，然而能指畢竟不是所指，因此歷史作品與歷史事實將不可避免產生一層隔閡。這種意見如果再加上比喻理論(theory of tropics)的推波助瀾，將更使歷史作品形同充滿隱喻與小說情節的文學作品。⁵

要說明歷史學界如何回應後現代主義是極為困難的，我們也許可能從兩個角度來討論。首先，就研究領域而言，最容易感受到後現代主義衝擊的歷史領域首推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與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此外當然還包括史學史(historiography)，不過一般而言仍把史學史歸類為思想史。⁶這類歷史領域由於處

⁵ 如 Hayden White 的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1973).

⁶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理的主題多半與哲學與文學相關，而後現代主義者又多半是哲學學者或文學評論者，因此兩者較有對話的可能。所以，在歷史專業中真正有心或有能力回應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多半屬於這兩個領域，尤其是史學史的研究者，更是對此有責無旁貸的壓力。

其次，就回應的成果言，則似乎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令人滿意的研究出現。所謂的令人滿意並不是指要讓歷史學從後現代主義的挑戰下完全解套，而是指其回應方式的有效性與合理性；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所出現的回應後現代主義的作品，不僅未能真正回應，甚至作品本身出現嚴重的理論誤謬問題，這種狀況可以艾坡比(Joyce Appleby)、亨特(Lynn Hunt)與傑考(Margaret Jacob)三位女史家所合著的《歷史的真相》(*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為例。這本書顯然對後現代主義抱持一種極不友善的立場：「按我們的看法，後現代主義者是一群心灰意冷的知識份子，不分馬克思主義或自由派人文主義，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或是自由解放的一切期望，全都予以駁斥……後現代主義是一種嘲諷的世界觀，甚至是絕望的世界觀。」⁷ 這個不友善的態度雖然源於後現代主義先對歷史學投以無情的批判，但艾波比等人似乎沒有合理的自解之詞：

我們不強調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或是全然令人滿意的因果解釋，卻要強調有必要竭盡所能做成最客觀之解釋。這是唯一的前進之路，也許不是一條走向未來的平直的進步之

1988), p. 596.

⁷ 艾波比等著，《歷史的真相》，薛綸譯，(台北：正中，1996)，頁191-192。

路，卻可走向更有知識活力、更民主的社會，走向一個我們樂意生活於其中的社會。這些算是美學或文學性的抉擇，因為牽涉的是說故事的方法，但歷史並不只是看文筆就可評定好壞的文藝寫作。我們的選擇是政治、社會和知識論上的。有政治性和社會性，是因為這些選擇反應了我們對某種歷史家社群和美國人社會的信念。在知識論的層次，它們反映了我們對於可知之事與如何知所持的立場。本著勤奮忠實的原則做來，可能呈現出相當真實(雖然不一定完全真實)的近代、古代歷史。⁸

艾波比等人只是說「有必要竭盡所能」或「本著勤奮忠實的原則」，就可呈現出「相當真實」的歷史，卻沒有針對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設定提出回應，作出有效的反駁。光只強調自身的努力與誠實就想要說服對方，似乎不是一個合理的態度。更有甚者，不從對方的理論設定切入來尋覓其漏洞，而只強調對方的理論設定將導向一種「心灰意冷」、「嘲諷」與「絕望」的價值觀，並對此暗示一種否定的態度。這種作法似乎正坐實了後現代主義所認為的知識並不客觀而常有意識形態介入，知識的論辯因此不是邏輯的而是意識型態的鬥爭。因此，艾波比等人非但沒有作出恰當的回應，還作了錯誤的示範。

另一種回應則較能針對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設定作出回應，但似乎還不夠充份，茲舉伊格斯(G. G. Iggers)的《二十世紀史學》(*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為例。伊格斯認為，歷

⁸ 同前引書，頁212。

史作品的客觀性可藉由學術社群所共守的邏輯來維持，他說：「每件歷史作品都是件人造物(construct)，但這件人造物是來自於史家與過去的對話，而這段對話又是發生在同具有理性判準(criteria of plausibility)的質問心靈所形成的社群中。」⁹在這裡，伊格斯的想法顯然來自孔恩(Thomas Kuhn, 1922-?)。另一方面，伊格斯也沿用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觀點，將客觀性的取得定位在「方法」而非「實在」(reality)。伊格斯認為，科學的方法雖然在西方得到充分的發展，但同樣的方法卻也能在東方加以運用，並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伊格斯相信，理性與邏輯可以超越文化、地域而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因此客觀性可以維持。伊格斯的問題在於，他似乎忽略了自然科學與歷史學方法論的不同。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60)中表示，科學並不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但也不是件虛構物。科學來自於一群擁有相同設定與規則來管理其論述的人所進行的研究；藉由共守的設定，同以相同的邏輯來研究自然界，因此能達致客觀。¹⁰孔恩的想法也許合理，但伊格斯將其運用於歷史學則不恰當。孔恩處理的是自然科學，主體與客體明顯對立而且主體能感知客體(無論使用儀器與否)，因此主體可以運用一套計量符號來處理客體而不涉入自身的價值觀；歷史學則不然，主體不僅是只能透過文字描述才能感知客體，而且在主體與客體無法截然劃分下，主體只能運用感覺性的

⁹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45.

¹⁰ 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文字來描述客體。¹¹ 自然科學與歷史學有如此的差異，伊格斯在借用孔恩的概念時卻沒有作出說明，另一方面，他在運用韋伯的想法時也有相同的問題，這些似乎都不足以駁斥後現代主義。

另一種回應則是對後現代主義表示歡迎，如英國的詹金斯 (Keith Jenkins) 與美國的懷特 (Hayden White, 1928-)。這兩位學者的的重要性在於他們都是受過傳統史學訓練的歷史學者，因此他們的想法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傳統歷史學界對後現代主義的接受度有多少。詹金斯曾在《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 中表示：「質問歷史家對真理的觀念、指出事實的多變性、主張歷史家是從意識型態的立場出發來寫歷史、強調歷史是容易被破壞的文字論述、認為『過去』和小說家在寫實故事中所隱喻的『真實世界』同樣是抽象的概念……凡此種種都推翻了過去、打破了過去，而在打破的裂縫中，新的歷史才能被寫成。」¹² 要放棄求真的觀念，並且認清歷史家寫歷史與小說家創作寫實小說並無不同，如此才能孕生出新的歷史寫作；照詹金斯這樣的講法，歷史學家必須在認清自己所寫的不是真實的過去，而是自己的意識型態之後，才能寫出新歷史。然而，史家為什麼需要這種表現自我意識型態的新歷史？它的功用為何？對此，詹金斯曾這麼說：

如果我們不以傳統的方式將歷史當成一個實在的知識，而是如其然地將歷史當成一個現代人對過去的看法。那麼，這樣的歷史很可能有一種強烈使人信服的力量，可以使前

¹¹ 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167.

¹² Keith Jenkins, *Re-thinking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66.

此被隱藏或保密的、前此被忽略或迫退的過去，多方面爲人所見，因而能產生新的見解。這些見解實際上可以對於現在且在現在內部造成解放性和實質上的差異——而這也是所有歷史開始和回歸的所在。¹³

根據這段話，歷史學的角色將從一門「重建過去」的知識，轉變成一門「展現自我意識型態」的知識，這就是所謂的新歷史。對詹京斯而言，前者只是資產階級於十九世紀所建立的知識型式，如果歷史學以前者爲前提，將使歷史學淪爲資產階級的傳聲筒；惟有後者才能使歷史學成爲各階級、各立場的人都能運用的知識，才能將社會上原本被壓制的聲音重新釋放出來。¹⁴因此，詹京斯眼中的新歷史，是一門能呈現社會各意識型態的知識，而後現代主義的出現，正能幫助歷史學做到這一點。

相較於詹京斯的強調意識型態，懷特則偏重於歷史作品的文學性。他索性與後現代主義合流，逕自運用了文學理論與結構主義來進行歷史研究，如其《後設歷史》(Metahistory)便是代表。懷特在這本書中，對十九世紀的四位史學大師與四位歷史哲學家進行分析，他將他們的著作視爲文學作品，進行文本風格的分析。懷特與詹京斯一樣，並不認爲歷史學是一門「重建過去」的知識，而是一門「展現自我意識型態」的知識；只是懷特更進一步地指出，如果人們要挖掘出史家在寫作時所隱藏的意識型態，可以從史家的寫作手法入手，藉由分析其作品中比喻(tropes)與

¹³ Ibid., p. 68.

¹⁴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pp. 6-10.

情節(plot)的擬定，以找出其立場與訴求。¹⁵

根據以上所述，詹京斯與懷特雖然不認為歷史作品能重建過去，但卻認為歷史作品能表現出史家個人的立場，這其實顯示了他們理論上的錯謬。如果他們認為，儘管歷史作品不能再現(represent)過去，但卻能再現史家的風格與意識型態，那麼歷史學將不是不能求真，而是求真的對象需要更正，意即有關「過去」的「真」不可求，而有關「史家的意識型態」的「真」卻是可求。然而這個想法不合理的地方在於，如果詹京斯和懷特認為歷史作品的文字並不能再現「過去」，那這些文字又何能再現「史家的意識型態」，尤其是「過去」的「史家的意識型態」。詹京斯與懷特如果真的認為歷史學不能求真的話，那就應本著這樣的設定來推論，不應中途又說能從歷史作品中看到史家的意識型態與風格，這等於悖反原先的設定。因此，就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詹京斯與懷特的論點有嚴重的矛盾。

歷史學界面對後現代主義，大抵呈現出這三種回應。艾波比等人所呈現的狀況是一般史家的通病，善於描寫，然而沒有良好的哲學訓練，不免淪為道德性的勸說與鼓勵；雖然如此，史家求真的熱情以及對於史學現況的反省已在其著作中表露無遺。伊格斯的取向則較為深入，但卻不採取直攻後現代理論核心的路線，而迂迴採取別的進路來證明歷史知識的妥實性，這一點亦無不

¹⁵ 懷特認為史家寫作時，受到四種模式的影響：情節模式、論證模式、意識型態模式與比喻模式，每個模式又可分成四種形式。懷特便以這四種模式的彼此套用來說明史學作品所呈現的文學風格。請參閱White, *Metahistory*, pp. 1-42.